

电子图书



信息技术的结晶

人类文明的载体

网络的基本资源

成功

致家长和老师

——关于成功

在词典中，“成功”是一个平平淡淡的词，但在现实生活中，“成功”无疑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。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崇尚成功的时代。

随意浏览一份报纸，就会看到那些成功者的故事；隔段日子再走进一家书店，就会发现名人传记类的读物又换上了新的面孔；回到家里打开电视机，就会与“浓缩人生精华”的《东方之子》咫尺相处。于是，成功的偶像成为人们膜拜的对象，对于成功的渴望便构成一种集体性情结。

“同样天下父母心，望子成龙小霸王”，这是影视明星成龙为小霸王学习机作广告时用到的一句台词。成龙的广告效应，使小霸王学习机的月销售额曾奇迹般地达到了1亿元人民币。这条一流广告的成功之处，正在于它紧紧地抓住了望子成龙的父母心。

北京市青年联合会的一项调查，在问及当今家长们最关心的事情是什么时，子女教育被列在首位。而同时，被调查的对象中，高达93%的人竟然回答，只要子女能够上大学，自己可以不惜一切代价。中国传统的“望子成龙”思想，在年轻一代的父母身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凸现与强化。他们把对子女的高期望值纳入自己的人生目标，将自己年少时未能实现的美好愿望寄托在孩子身上。

孩子尚未出生，按照“零岁方案”，胎教已开始了；孩子上学了，父母们不惜重金，四处求人，把他们送到重点学校；双休日已名存实亡，还得送他们上各类辅导班补习班。成材！升学！一切都是为了孩子能够“出人头地”。在笔者供职的单位，每逢星期六，便有成群结队的家长，拎着换洗过的衣被，提着装着鸡汤、排骨汤的保温桶，乘车到70公里外的襄樊五中，去看望在那里上重点高中的孩子们。三年间，风雨无阻，无怨无悔，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！

1997年，《中国青年》杂志特别策划了一期《救救今天的年轻父母》。在《子女成材路上的“殉道者”》一文中，我们目睹了来自“陪读村”的采访报告：从80年代至今，来自全国各地的考入北京音乐学院附中、附小的学生的家长们，纷纷在音乐学院东门外的一片杂乱不堪的居民区中赁屋而居，以便就近照顾他们的孩子。那些年轻的父母，绝大多数是辞职而来的，其中，有的是省电台的节目主持人，有的是部队文工团的军官，他们不惜牺牲自己的大好时光，来换取儿女的成材。享誉世界的小提琴家吕思清，就出自这个“村”，他的父亲陪伴了他整整10年。刚到北京时，这位父亲满头乌发，身板挺拔，离开北京时却双鬓斑白，老眼昏花，背驼腰弯，这辛酸的一幕实在让人心颤。然而，能够像吕思清那样取得骄人成绩的，毕竟是凤毛麟角。音乐学院附中陈南岗校长坦率地说，一些学生的才能根本不在音乐上，可家长非让他学不可，你跟他说了破嘴都不行，到最后是什么结果？高不成低不就。我们已不忍心去问那些含辛茹苦的家长，认为自己所付出的代价是否值得，他们的负担已经够沉重了。

《中国青年》接着连续四期开辟版面，就“我们现在怎样做父母”一题展开讨论。全国各地的读者对此反响强烈，短短数日，近千封来信来稿从不同侧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，集中起来有两点：中国的父母是当今世界上最苦

最累的父母，中国的父母应该尽快从子女教育的重压中解脱出来，父母身体力行的奋斗和创造才是对子女成材最好的教育；造成当今中国父母最苦最累的根本原因是“应试教育”，如果不从根本上改革教育的现状，中国年轻的父母们以及他们的子女就不可能从苦与累中解脱出来。读者强烈呼吁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应该尽快拿出切实可行的措施，实现向素质教育的全面转变。

“应试教育”即所谓的“选拔教育”，换句话说，是一种“淘汰教育”，升学考试是它的唯一目的，它只面向少数学生，又违背了学生发展的规律，结果造成学生的片面、畸形发展。而素质教育则要求面向每一个学生，因材施教，尊重学生的个性特点，使他们在知识和能力、身体与心理、人格与品德等各个方面得到协调发展，让每一个学生都能获得成功。

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，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。这里有教育观念的转变，有课程设置的转变，有教材内容与教学方法的改进，特别是要有测试方法与评价方法的改进，迈出的每一步，都将是艰难的，而又是必然的。全国十杰中青年教师、闸北八中校长刘京海在“成功教育”的探索与实践中，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。所谓“成功教育”即主张人人都可以成功的一种教育模式，在教师确立相信每一个学生都能成功的信念的前提下，通过教师帮助学生成功，学生尝试成功，最后逐步达到自己成功。其核心是通过反复成功，提高学生的自信心和学习积极性，促使学生取得多方面的成功，并为学生的社会成功做好准备。

“成功教育”的道德基础，是由乐观主义所支撑的。我们相信每一个学生都能成功，但这时的成功已不是“出人头地”的同义词，它应该被注入“平凡”的内容。我们也并不讳言失败。但我们可以做到摒弃“失败教育”，这有赖于我们做一个成功的家长、一个成功的老师。

笔者沿着众多成功者的足迹，似乎已探寻到一些成功的奥秘。而稍一思量，又觉得无甚高论。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讲：

凡做某事最成功的办法，亦即是最平常的办法。

与成功相约

扮演你设计的角色

——罗森塔尔效应

罗森塔尔曾在哈佛大学做了一个有趣的实验。被试者包括三组学生和三组白鼠。

他告诉第一组学生：“你们非常幸运，将训练一组聪明的白鼠，这些白鼠已经经过智力训练且非常聪明了。”

他又告诉第二组学生：“你们的白鼠是一般的白鼠，不很聪明，也不太笨。他们最终将走出迷宫，但不能对他们有过高的期望，因为它们仅有一般的智力，所以它们的成绩也仅为一般。”

最后，他告诉第三组的学生说：“这些白鼠确实很笨，如果它们走到了迷宫的终点，也纯属偶然。它们是名副其实的白痴，自然它们成绩也将很不理想。”

后来，学生们在严格的控制条件下进行了为期6周的实验。结果表明，

白鼠的成绩，第一组最好，第二组中等，第三组最差。而实际上，所有被试的白鼠都是从一般的白鼠中随机取样并随机分组的。实验之初，三组白鼠在智力上并无显著差异。显然是由于进行实验时三组学生对白鼠具有不同的态度，从而导致了不同的实验结果。学生们虽不懂白鼠的语言，白鼠却“懂得”人对它的态度。

上述实验后来又在以学生为对象的实验中得到证实。该实验是由两位水平相当的教师分别给两组学生教授相同的内容，所不同的是，其中一位教师被告知：“你很幸运，你的学生天资聪颖。然而，值得提醒的是，正因为如此，他们才试图捉弄你。他们中有的人很懒，并将要求你少布置作业。别听他们的话，只要你给他们布置作业，他们就能完成。你也不必担心题目太难。如果你帮助他们树立信心，同时倾注真诚的爱，他们将可能解决最棘手的问题。”另一位教师则被告知：“你的学生智力一般，他们既不聪明也不太笨。他们具有一般的智商和能力。所以我们只期待一般的结果。”

在该学年底，实验结果表明，“聪明”组学生比“一般”组学生在学习成绩上整整领先了一年。其实在被试者中根本没有所谓的“聪明”学生，两组被试的全都是一般学生，唯一的区别就在于教师对学生的期望态度不同，导致了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他们。其中一位教师把这些一般的学生看作天才儿童，因而就作为天才儿童来施教，并期望他们像天才儿童一样出色地完成作业，使得他们有了突出的进步。

这就是罗森塔尔效应：你看待人或事的方式，即是你对待人或事的方式，而且，你对待他们（它们）的方式，也就是他们（它们）发生变化的方式。态度的效应如此明显，以致于有的心理学家说：“态度决定一切。”的确，态度使我们所有的体验和活动都染上了心境的色调。

我们不能选择别人对自己的态度，但我们可以选取自己对自己的态度。

有人曾问三个砌砖工人：“你们在做什么？”

第一个工人说：“砌砖。”

第二个工人说：“我正在赚工资。”

第三个却说：“我正在建造世界上最富特色的房子。”

简单的回答，使各人的工作态度跃然纸上：第一个工人是为工作而工作；第二个工人是为赚钱而工作；第三个工人则是为创造性的目标而工作。据说到了后来，前两人一生都是普普通通的砌砖工人，而第三个工人则成了有名的建筑师。

积极的人生态度，有助于发掘自我潜在的能力，成为“自我实现的人”。对于他们来说，在平庸的水平上或者只是在适当的水平上完成任务，是不会满意的。毫无例外，他们对自己承担的任务都保持了高度的责任感，并为此付出全部的努力。即使面对的是平凡的工作，他们也会确立不平凡的期望，去争取不平凡的成就。

美国生物学家吉耶曼和沙利，在长达 21 年的漫长岁月里，克服同行们的怀疑和讥讽，克服了恩主中断资助的压力，克服了科学上和技术上的种种困难，顽强地进行下丘脑激素的研究工作。有些时候，他们要一个一个地处理 27 万只羊脑，才能获得 1 毫克促甲状腺释放因子的样品。1977 年，他们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奖金。当记者问他们是怎样取得成功的时候，他们幽默地说：“那就是逐个地分析 100 万只羊脑！”

如果没有对于成功的坚定信心，遇上几次挫折，便怀疑自己的能力，给

自己贴上不行的“标签”，那就使什么事看来都是灰暗的。这时，必须改变思考的方向，删除消极的“词句”，使自己恢复自信心，树立起自我成功的形象。

一位高三学生在一次测验中，直到老师收卷时，才发现漏做了一题。以后测验时，就总担心时间不够，脑子里都是焦虑和失误的情景，结果，成绩越来越差。

班主任了解情况后，开导她说：“失误不就是这几周吗？可十多年的学习中，你有多少成功的体验啊！”

她眼睛一亮，但很快又失去信心地说：“可那都是过去。”

老师说：“对每一次考试而言，上一次都是过去时。”又问：“如果让你从影集中选一张照片放大，你会选好的还是差的？”

“当然是好的。”她不假思索地说。

“成功的、美好的形象会增强我们的信心。心灵是一部摄影机，记忆里成功、失误的瞬间都是它的作品。考试时，你一再翻印那些失误、甚至失真的‘照片’，它只会徒增你的紧张、焦虑，为何不试试放大一些成功的‘照片’？我们需要信心。”

这位学生在老师的启发下，在以后的几次测验中，总是带着微笑走向考场，直到走进大学。

把成功的“照片”放大，近似于心理学家们所说的“临场默想术”。为了取得成功，你必须在大脑中“看”到你正在取得成功的形象，并使这种积极的形象反复呈现，成为潜意识的组成部分。

你要与人作一次交流，可以先默想说话的内容、所持的态度、运用的语气、对方的反应，以及整个谈话环境和气氛，把自己事先沉浸到谈话环境中去，这样就会取得理想的谈话效果。

你要去做某件事，动手前先在脑中酝酿一下工作的全过程，你的姿态、你的动作、所用工具、资料信息、工作对象的反应、完成后的效果。这样能使你的整个与此有关的心智、神经、肌肉得到一次协调配合的“演练”，犹如向电子计算机设计与输入一个完成任务的程序。

成功，有时很简单，只需说一声：我要成功！我能成功！然后去扮演你设计的角色。

订一个目标，实现它——有志者事竟成

羽毛球运动员龚智超，原来在湖南队时，不少人对她是否能够成材持怀疑态度。她的身体条件很一般，身高 1.63 米，体重不足 50 公斤。在国际羽坛高手如云、运动员身材高大化的赛场上，龚智超看起来并不显眼。

然而，当这位文文静静、身体单薄的姑娘凭实力跻身国家队后，人们很快对她刮目相看。她四处征战，面对世界羽坛的老将名宿，全无怯意，让她们一个一个地成为手下的败将。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，就成为世界级高手。1996 年 4 月，她首次代表中国参加亚洲锦标赛，就技压群芳，取得冠军。她的打法属拉吊型，与印尼名将王莲香相似。当时与王莲香对垒时，龚智超从容不迫，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你拉我也拉，反正我比你年轻，体力比你强。结果，硬是把这位中国队的老“克星”拉下了马。从默默无闻到排名世界女单第一，龚智超只用了 11 个月，创造了国际羽坛排名上升的最快纪录，被国

际羽联称为“中国最新球星”。

中国羽毛球队总教练李永波曾对记者称赞龚智超说：“她的心里总有一个目标，然后就一步步地去实现，她是一个智慧型的选手。”

订一个目标，去实现它。成功的起点，正在于此。当有人问及爱因斯坦成功的秘诀时，爱因斯坦写下了众所周知的公式：

$A=X+Y+Z$ （即是说，成功=正确方向+艰苦劳动+少说废话）

一个人有了明确的目标，他就会认识到自己行动的意义，按照目的自觉调节自己的行为，发挥所有的潜能，实现自身的价值。

被称为“俄国科学始祖”的罗蒙诺索夫，19岁时徒步两千公里从家乡到莫斯科求学。他所在的那所贵族教会学校全部用拉丁文讲课。罗蒙诺索夫不懂拉丁文，只好先补习拉丁文。老师瞧不起他，要他坐到最后一排去，十三四岁的同学们更是指手划脚地讽刺他：“一个20岁的大傻瓜来学拉丁文啦！”老师的冷眼，同学们的讥讽，他全不放在眼里。他的目标已定，只是埋头学习，无暇顾及人家说长道短，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赢得了老师的赞赏和同学们的尊敬，并一步步走进了著名科学家的行列。

著名数学家陈景润上高中时，曾任国立清华大学航空系主任的数学老师沈元，给他们讲了数论中的哥德巴赫猜想。沈元又说，自然科学的皇后是数学，数学的皇冠是数论，哥德巴赫猜想则是皇冠上的明珠。从那时起，喜欢数学的陈景润，就暗暗下定决心，要攻克这一难题。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，他率先证明了“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二个素数的乘积之和”。作为证明结果的“陈氏定理”，在国际数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，被称为“辉煌的定理”。

徐迟先生的报告文学《哥德巴赫猜想》，使陈景润成为无数少年心中的偶像。“我也要像陈景润叔叔那样，拿下世界第一。”当这句话出自一位名叫袁亚湘的10多岁的农民儿子之口时，谁都觉得是幼稚可笑梦想。然而，十几年后，袁亚湘梦想成真。

袁亚湘天资聪敏，对数学尤为痴迷。上小学三年级时，他把阿拉伯数字算来算去，突然发现一个秘密：整数48分别可被2、3、4、6、8、12、16、24整除，而这8个数字之和是75，奇妙的是75又被3、5、15、25整除，它们之和又恰巧是48。他问老师，48和75是一对什么数？老师一时语塞，他没想到一个8岁的儿童竟会提出教科书上找不到的问题。年幼的袁亚湘总是超前地把下一学期的数学课程学得滚瓜烂熟。后来，老师把他从4年级跃升到5年级，与年长3岁的哥哥同班上课。

不曾料想，初中毕业后，父亲给他出了道难题。因家里无力负担，两兄弟只能有一个升上高中。哥哥年纪比他大，错过了机会，也许就不会再有学习机会了。在经历了长时间痛苦的抉择之后，袁亚湘辍学了。一位姓陈的老师得知情况后，惋惜地对他说：“你是棵好苗子，千万不能荒废，要想办法读书。”一年之后，袁亚湘终于又重新跨入了校门。1976年高中毕业后，他又回到了自己耕耘过的土地上，白天在田地间干活，晚上，在煤油灯下，用数字、公式、定理去编织色彩斑斓的梦。直到1977年，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，他振奋不已，没日没夜地复习了一个多月，考上了湘潭大学，成了该校数学系计算数学专业的一名新生。从此，他如鱼得水，尽情地遨游在数学的海洋中。

1982年2月，袁亚湘接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部发来的录取通知书。他仅

用半年时间就学完了规定的所有科目，获得硕士学位。11月，袁亚湘到了英国剑桥大学应用数学及理论物理系，他的导师是国际计算数学界大名鼎鼎的鲍尔教授。短短的几年里，袁亚湘先后完成了16篇具有世界水平的论文，在取得博士学位之前，就破格选进剑桥大学菲茨·威廉姆学院任研究员。鲍尔教授感慨地说：“在所有的学生中，袁亚湘是出类拔萃的。”

1988年9月，袁亚湘谢绝了鲍尔先生的挽留，回国了。他又回到了阔别6年的计算中心实验楼。不久，他证明了“一类尺度算法的最小 Q —一阶收敛因子为1”的理论，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证明这一结果的人。1990年，袁亚湘被授予博士导师资格，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博士导师，年仅30岁。

袁亚湘的成功，首先就在于他有着一个高远的目标，就像海伦·凯勒说过的：“当一个人感到有一种力量推动他去翱翔时，他是决不会去爬行的。”

著名探险家约翰·戈达德，还仅仅是美国洛杉矶郊区一个没有见过大世面的15岁少年时，就列表写下了气势不凡的《一生的志愿》。他立下志向，要“到尼罗河、亚马逊河和刚果河探险；登上珠穆朗玛峰、乞力马扎罗山和麦特荷思山；驾驭大象、骆驼、鸵鸟和野马；探访马可·波罗和亚历山大大一世走过的道路；主演一部‘人猿泰山’那样的电影；驾驶飞行器起飞降落；读完莎士比亚、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；谱一部乐曲；写一本书；游览全球……”，共列有127个目标。之后，经过顽强的努力，历经18次死里逃生，终于实现了其中的106个。

人的潜力竟如此之大！订一个目标，你一定能实现它，只要沿着的是一个正确的方向。

性格决定命运——陈逸飞的口头禅

80年代初，国门刚刚打开，陈逸飞怀揣着38美元，只身踏上了闯荡美国的人生旅程。在大洋彼岸，他没有任何经济、人文背景，此行，他带着梦想，也冒着风险。

勇于冒险，似乎是他的一种天性。小时候，他曾将阳伞当作降落伞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从二楼阳台跳下，侥幸没有出事，却着实让他的父母虚惊一场。陈逸飞的父亲是位化学工程师，他期待着儿子长大后能如同自己一样，以技术立足于社会，但陈逸飞受到的却是来自母亲的影响，自幼爱上了绘画。

陈逸飞的母亲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。当他随着母亲到教堂时，那管风琴浑厚的共鸣，少年歌手和谐的歌声，慈祥善良的圣母塑像，和镶嵌在门顶及墙面上的玻璃彩画，这是艺术给他的最初启蒙。进入中学后，他参加了课余美术班，窘迫的家境使他难以走进画室，周末就从母亲的菜篮中掏出蔬菜、水果甚至酱油瓶、醋瓶摆弄，练习实物写生。初中毕业后，他考取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，尽管父亲对他的选择不以为然，但当一个画家，是他梦寐以求的追求。毕业后的几年间，他创作出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大型油画《黄河颂》、《开路先锋》、《红旗颂》等作品，在全国美展中屡获好评。1976年他与魏景山合作创作的油画《占领总统府》，曾获全国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评选一等奖，后陈列在中国军事博物馆内。陈逸飞在画坊声誉鹊起之时，也被一些人冠以“形式主义倾向”，因为他对于色彩感性的过于讲究，与当时特定的环境相去甚远。在对自由奔放的艺术境界的渴望中，他把眼光投向了外面的世界。

刚到美国时，陈逸飞曾在博物馆打工修画，从中接触了大量西方名画，加深了对西方油画制作的认识。但修补匠并非他的志向所在。于是，他倾其所有买了一张通用火车票作欧洲的自助旅游，遍访十余个国家的美术馆，尽情吸收大师们的养分。为节省开支，晚上，就蜷缩在火车上。生活是清苦的，而对艺术的精妙的感受却日臻丰富起来，他终于在浓郁的东方韵味与娴熟的西方技法的结合点上，找到了自己的坐标。那些温馨弥漫的水乡风景，那些粗犷豪放的高原风情，那些吹箫拨弦的江南女子，那些奏笛抚琴的西洋姑娘，无不以杰出的“浪漫写实主义”画风，被国际美术界所称道。

当初，路过纽约哈默画廊，面对着它的富丽堂皇，陈逸飞不敢贸然跨进门去。但不出三年，他便与这家美国颇具实力的画廊签约并在此举办了第一次个人画展。之后，又先后举办过五次，每一次的展出作品都全部售罄。欧美不少收藏家争相收藏陈逸飞的画作。1991年，他以油画《浔阳遗韵》首次参加佳士得香港秋季拍卖会，以137万港元成交，破在世华人油画拍卖的最高纪录。1994年，他以西藏为题材的油画《山地风》，在北京嘉德秋季拍卖会上，又以286万元成交。1995年，陈逸飞与当今世界最具权威的英国玛勃洛画廊签约，成为第一位与之签约的亚洲画家。1996年底，玛勃洛画廊为他主办世界巡回画展，第一站选在生他养他的上海，然后是北京，如潮的观众在欣赏他独具魅力的画作的同时，也领略了他作为一个成功者的风采。

人们看到，陈逸飞依然那样温文尔雅，事业的辉煌，并不曾给他增添一丝骄气。他把人生旅程比作一个个小站，过了一站又一站，让生命多闪几次光，多耀几次火花，是他的理想。当他实现了作一个画家的梦想之后，又尝试用电影这种流动的画面表达对生活的感受，他自任导演，用画画儿赚来的钱，投资拍摄了《海上旧梦》和《人约黄昏》，后者曾在戛纳电影节上入围“特别荣誉奖”，并在中国电影“金鸡奖”中获得“最佳摄影”与“最佳美术指导”奖。

陈逸飞在事业上经历了荣辱与沉浮，在感情上也伴随过孤独与挫折，但人们在他的脸上，看到的总是乐观与自信。他把生命比作一个球体，上面的光折射下来并不是平面的，而是立体的。光线不同，球体就有明有暗，不可能是通体明亮的。人的一生如果光亮照得多一些，那么球体的明亮部分就多些，暗部就少些。活着，就是要努力让光亮照得多一些。在这种积极的人生信念支撑下，他成为“勇敢的冒险家”，不断地在寻求新的起跑点。当人们沉醉于他笔下低吟浅唱的江南水乡时，他已把笔触转向了浓烈淳厚的西藏民风；当他的画拍价最好时，他又去拍电影，圆他少年时代向往电影的梦。

一个梦想，就是一次飞跃。

其实，每个人都有自己潜在的才能，也都会遇上把他引向成功之路的机会，但很多人由于性格过于软弱、羞怯，或者没有勇气突破环境的束缚，而离成功越来越远。梦想，正是最大限度地谋求成功的愿望，它能使人的才能像火一样燃烧起来。即使身处逆境，也见不到成功的任何迹象，拥有梦想的人仍将满怀信心，一往无前，迈向生命的新台阶。

“我有一个梦想！这一定要实现！”你對自己这样大声呼喊过吗？

成功不需要天才——对智商的态度

爱因斯坦到了天堂后，将与另外四个人住在一起，他向他们做了自我介

绍。

“很高兴见到你”，同室的第一个人说，“顺便告诉你，我的智商是 180。”

“好的，我们在一起可讨论量子物理。”

“我的智商是 159”，第二个人自我介绍。“很好，我们可以讨论最新的数学理论。”

“至于我么”，第三个人说，“我的智商是 132。”“很高兴”，爱因斯坦回答，“我们可以讨论目前的工艺水平。”

“很荣幸见到你”，最后一个说，“但我的智商仅 85。”“没关系”，爱因斯坦握着这个人的手说，“告诉我，你认为哪家银行的利率高？”

这个杜撰的故事表明，每个人的头顶上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。大狗有大狗的叫法，小狗有狗的叫法。小狗千万不要因为大狗的存在而自惭形秽，小狗的叫声中自有大狗所不能替代的魅力。它应该坦然而大声地叫，用上帝赋予它的嗓音叫。

成功，的确需要足够的智商。智商，即智力商数，这是心理学智力测验中所用的一个专门术语，公式为： $\text{智力年龄} \div \text{实足年龄} \times 100 = \text{智力商数}$ 。智商为 100 上下，表示智力正常或中等；120 以上，表示聪明；130 以上，表示智力超常或“天才”；80 以下，表示愚笨。我们绝大多数人的智力只是“正常”。不过没关系，因为成功并不需要天才，它同样青睐普通人，你所需要的仅是执着不懈地追求你的理想，直至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，把你的并不出众的素质开发到不同寻常的程度。

“为学不可全恃明快，要思量到迟钝处”（曾国藩语），智商高也罢，平平也罢，在“迟钝处”下苦功夫，是成功者所必备的“公因子”。

中科院院士林群，回忆起陈景润时，曾激动地说：“陈景润令我钦佩，因为他与常人不同，有超常的毅力、耐性和不惜代价的投入。”

有一次，陈景润提出：“一个三元五次多项式，怎样找出所有的解答？”林群说，即使一元问题，也无从着手，如同是海底捞针。可是，大约过了一个月，陈景润便告诉他：“全部解答都找到了，不信你可以一个一个代到方程中，看看是不是满足。”林群问他是怎么找出来的，他说：“找到一个就少一个，一个个找，就是要肯花时间。”

陈景润曾谈起他治学的秘诀：

“白天拆书，晚上装书。我就像玩钟表那样，白天把它拆开，晚上再一个原件一个原件地装回去，装上了，你才懂了。”

“做研究就像登山。很多人沿着一条山路爬上去，到了最高点，就满足了。可我常常要试上十条山路，然后比较哪条山路爬得最高。凡是别人走过的路，我都试过了，所以我知道每条路能爬多高。”

智商超群的陈景润尚且要下这等苦功夫，一般人哪能自恃聪明，而不去努力呢。明白这番道理后，还是让我们的话题回到“智商”本身，它虽然不是成功的唯一因素，但毕竟是关键的因素之一。

实际上，我们中很少有人接受过科学的智力测验。我们所说的智商，是对自己或别人智力高低的一种评价。智力，是由观察力、记忆力、想象力、思维力和注意力等五种基本因素有机结合构成的。观察力是智力活动的门户和源泉；记忆力是智力活动的仓库和基础；想像力是智力活动的翅膀和富有创造性的重要条件；思维力是智力活动的方法和核心；注意力是智力活动的警卫、组织者和维持者。而创造性是智力品质的集中表现，智力水平的高低

一般都可以用创造力的大小来标示。

创造力，是书写自我历史的潜在能力，是富于更新活力的生命力量。正如罗曼·罗兰所说：“生命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创造的行动。”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拥有创造力，像智力的其他方面一样，经过后天的努力，创造力是可以不断提高的。

下面，我们不妨按照美国普林斯顿创造才能研究公司总经理、心理学家尤金·劳德塞所设计的测验题，用 10 分钟的时间来测一下自己的创造性的高低。自测时，在每一个题后诚实地用“ A ”表示同意，用“ B ”表示不清楚，用“ C ”表示不同意。然后，据题后的附表经过统计，得到答案。

1. 我不做盲目的事，也就是我总是有的放矢，用正确的步骤来解决每一个具体问题。

2. 我认为，只提出问题而不想获得答案，无疑是浪费时间。

3. 无论什么事情，要我发生兴趣，总比别人困难。

4. 我认为，合乎逻辑的、循序渐进的方法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。

5. 有时，我在小组里发表的意见，似乎使一些人感到厌烦。

6. 我花费大量时间来考虑别人是怎样看待我的。

7. 做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事情，比力求博得别人的赞同要重要得多。

8. 我不尊重那些做事似乎没有把握的人。

9. 我需要的刺激和兴趣比别人多。

10. 我知道如何在考验面前保持自己的内心镇静。

11. 我能坚持很长一段时间解决难题。

12. 有时我对事情过于热心。

13. 在特别无事可做时，我倒常常想出好主意。

14. 在解决问题时，我常常单凭直觉判断“正确”、“错误”。

15. 在解决问题时，我分析问题较快，而综合所收集的资料很慢。

16. 有时我打破常规去做我原来并未想到要做的事。

17. 我有收集东西的癖好。

18. 幻想促进了我很多重要计划的提出。

19. 我喜欢客观而又有理性的人。

20. 如果要我在本职工作之外的两种职业中选择一种，我宁愿当一个实际工作者，而不当探索者。

21. 我能和自己的同事或同行们很好地相处。

22. 我有较高的审美感。

23. 在我的一生中，我一直在追求名利和地位。

24. 我喜欢坚信自己结论的人。

25. 灵感与获得成功无关。

26. 争论时，使我感到最高兴的是，原来与我观点不一致的人变成了我的朋友，即使牺牲我原先的观点也在所不惜。

27. 我更大的兴趣在于提出新的建议，而不在于说服别人接受这些建议。

28. 我乐意独自一人整天“深思熟虑”。

29. 我往往避免做那种使我感到低下的工作。

30. 在评价资料时，我觉得资料的来源比内容更为重要。

31. 我不满意那些不确定的和不可预言的事。

32. 我喜欢一门心思苦干的人。

33. 一个人的自尊比得到他人的敬慕更为重要。
34. 我觉得那些力求完美的人是不明智的。
35. 我宁愿和大家一起努力工作，而不愿意单独工作。
36. 我喜欢那种对别人产生影响的工作。
37. 在生活中，我经常碰到不能用“正确”或“错误”来加以判断的问题。
38. 对我来说，“各得其所”、“各在其位”，是很重要的。
39. 那些使用古怪和不常用的词语的作家，纯粹是为了炫耀自己。
40. 许多人之所以感到苦恼，是因为他们把事情看得太认真了。
41. 即使遭到不幸、挫折和反对，我仍然能够对我的工作保持原来的精神状态和热情。
42. 想入非非的人是不切实际的。
43. 我对“我不知道的事”比对“我知道的事”印象更深刻。
44. 我对“我可能是什么”比对“这是什么”更感兴趣。
45. 我经常为自己在无意中说话伤人而闷闷不乐。
46. 即使没有报答，我也乐意为新颖的想法花费大量时间。
47. 我认为，“出主意没什么了不起”这种说法是中肯的。
48. 我不喜欢提出那种显得无知的问题。
49. 一旦任务在身，即使受到挫折，我也要坚决完成。
50. 从下面描述人物性格的形容词中，挑选出 10 个你认为最能说明你性格的词：精神饱满的、有说服力的、实事求是的、虚心的、观察力敏锐的、谨慎的、束手束脚的、足智多谋的、自高自大的、有主见的、有献身精神的、有独创性的、性急的、高效的、乐于助人的、坚强的、老练的、有克制力的、热情的、时髦的、自信的、不屈不挠的、有远见的、机灵的、有组织力的、铁石心肠的、思路清晰的、脾气温顺的、可预言的、拘泥形式的、不拘礼节的、有理解力的、有朝气的、严于律己的、精干的、讲实惠的、感觉灵敏的、无畏的、严格的、一丝不苟的、谦逊的、创新的、泰然自若的、好交际的、孤独的、不满足的、易动感情的、柔顺的、好奇的。

第 50 题，下列每个词得 2 分：精神饱满的、观察力敏锐的、不屈不挠的、柔顺的、足智多谋的、有主见的、有献身精神的、有独创性的、感觉灵敏的、无畏的、创新的、好奇的、有朝气的、热情的、严于律己的；下列各词得 1 分：自信的、有远见的、不拘礼节的、不满足的、一丝不苟的、虚心的、机灵的、坚强的；其余各词得 0 分。

累计得分总数，可分为 6 个等级：得分 110—140，为“非凡”；得分 85—109，为“很强”；得分 56—84，为“强”；得分 30—55，为“一般”；得分 15—29，为“弱”，得分 -21—14，为“差”。

准确地说，这种测试反映的是你对于创造的姿态。不过，谁都知道，王军霞在赛场上是用梅花鹿那样的姿态奔跑，而摘取桂冠的。

成切需要多元智慧——情商的理念

一位心理学家曾在一家幼儿园里做过这样一个实验：

他请来一群小孩，并告诉他们：“这里有软糖，你们现在就可以拿一块吃，但如果等我出去办完事回来才吃，就可以得到两块。”说完，他就走了。

有些孩子急不可耐，马上就拿起一块吃掉了。另一些等了几分钟后，也把糖吃了。其余的在那里等了对他们来说显得漫长的 20 分钟，为了抵挡眼前的诱惑，有的唱歌跳舞，有的假装睡觉，一直等到这位心理学家回来。

后来进行的跟踪调查发现，那些能够等待 20 分钟的孩子长大后，为了达到目标，能够较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，适应外部条件的变化，并取得成功。而那些急于把糖吃掉的孩子长大后，不管智商如何，各方面的成就都比前一类低。

1995 年，美国《时代》周刊专栏作家、哈佛大学心理学博士丹尼尔·戈尔曼，在他的新著《情感智慧》中，提出了“多元智慧理论”。他特地举出这个例子，以说明情感智慧的存在及意义。除了自我控制情绪的能力，情感智慧还包括自我觉察、自我激励以及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。

戈尔曼还把“情感智慧”缩略为“情商”。很快，这个与智商对应的词，通过信息网络在全球流行开来，这正表明在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、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多的当今社会，人们对情商的渴求。与之同时，人们也渐渐接受了戈尔曼的初听起来觉得有些偏颇的观点：“一个人的成功，只有 20% 靠智商，另外的 80% 要靠情商，也就是与人相处和合作的品德与能力。”换句话可以说成：智商只是使人赢得机会，而情商则决定是否能够成功。因为，现代的成功者，已不可能游离在群体之外。

譬如，今天的科学实验已经不像本世纪初那样，仅仅靠一两个人就可以获得重大成果。1995 年，科学家们发现第六个夸克存在的依据时，两个实验组的工作人员加在一起，超过了 800 人。他们都是高智商的人，但这时每个人的智慧只有在和其他人的智慧融为一体时，才有意义。一些充当配角的人，还必须调整自己的情绪，克服失落感，才会享受到成功的快乐。

那些自视过高，性情孤傲，难以与别人沟通和相处的人，即使才华出众，智商很高，也往往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，最终难以施展自己的才能，沦为失败者。1997 年暮春时节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里，在短短的几周内，连续发生了两起中国留学生自杀事件。这两人中，一位是电脑博士，另一位是生化博士后，如此优秀的人才走上了绝路，引起了扼腕叹息的人们的思索。知情人说，他们都是单身一人，平日缺少朋友，从不主动与人交谈，又都面临着沉重的精神压力，前者因找不到工作而苦恼，后者常与指导教授发生争吵。一些有识之士认为，留学生中，总有人自认是天之骄子，这些人实际上只会在学校读书，不了解外面的社会。他们以为学习成绩好就会在任何时候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，结果一遇到挫折或不顺心的事，就感到非常没面子，甚至觉得没有出路。如果他们在提升自己智商的同时，能够学会驾驭心情，学会与人相处，增强承受压力的能力，成功本应属于他们。

在人们的心目中，售票员的工作无需多高的智商，而李素丽却在这样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了不平凡的业绩，成为社会广泛赞誉的成功者，她的过人之处就恰在于情商。她说：“用力去做只能达到称职，用心去做才能达到优秀。”乘客赶车时，她不说：“您别着急，我等着您。”而是说：“您别着急，我和全车的乘客都在等着您。”几字之差，换来了车上乘客的支持。一位姑娘把座位让给一位抱小孩的乘客时，这位乘客好像这个座位就该她坐似的，没有丝毫谢意，让座的姑娘有些不高兴。李素丽赶紧走过去，逗着孩子说：“小朋友，阿姨上了一天班这么累，还让座给你，快谢谢阿姨！”小孩的母亲一听，感到失礼了，立即向姑娘道谢，李素丽的一句话，便使姑娘的气消了。

在车厢这个小社会，李素丽用自己的一句话、一个眼神、一个动作调节乘客的情绪，营造出一个怡人的空间。她对待乘客经常是“你发火，我耐心；你烦躁，我冷静；你粗暴，我礼貌”，得理也让人，这就是她所说的：“让乘客下了台阶，我的服务就上了台阶。”

人事纷纭，在立身处世时，既要保持自己的品性，独立不羁，又要待人以光风霁月般的风范、春风和煦般的宽容与温馨，做到这一点，需要经过一段人生的修炼。这个过程，说难，很多人一辈子也达不到；说容易，只是孔子所说的“忠恕”二字。

有一次，孔子与弟子们坐在一起闲谈时说：“我的学说可以用一个根本的原则贯通起来。”不过当他见到大部分弟子不解其意时，便离席而去。那些弟子们问曾子，老师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，曾子说：“老师的学说，就是忠恕罢了。”忠恕，就是要用如同关切自己一样的心情去体察、关心别人：自己想树立的也帮助别人树立，自己想达到的也帮助别人达到，同时，自己不想要的就不能施加给别人。

一个人，多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，就能够赢得别人的好感、信任和尊敬，成功之路会变得平坦起来。反之，那些恃才傲物，以自我为中心处世的人，赢得的大都只能是反对票，这无疑是在给自己的成功之路增大阻力。

有一回，被称为日本歌舞伎一代大师的勘弥扮演一位长途徒步旅行的老百姓，正当他要上场时，一个门生提醒他说：“师傅，您草鞋的带子松了。”他回了一声：“谢谢你呀。”然后立刻蹲下来，系紧了草鞋的带子。当他走进门生看不到的舞台入口处时，却又蹲下，把刚才系紧的带子，又放松了。他原本是试图以草鞋的带子都已松垮，去表现一个长途徒步旅行者的疲惫之态。正巧，那天有位商人到后台参观，亲眼目睹了整个过程。戏演完后，他向勘弥说：“您该当场教训那位门生，他还不懂演戏的真谛。”勘弥回答说：“别人的亲切必须坦率接受。当时我若是骂那个年轻人，会有怎样的结果？今天，他提醒我的是鞋带松垮的事，可是，有时碰到的就不是这一类的事。例如，我若是披上背后有了大破绽的外褂要出场，他发现了却可能会想成，‘这大概又是师傅的另一种表达剧情的演技罢’，于是，他就不敢提醒我，我呢？就这样上了舞台，出了洋相。要教导门生演戏的技能，机会还多的是。在今天的场合，最要紧的是要以感谢的心去接受对方的亲切。”

从勘弥的故事中，我们懂得，善待他人，就是善待自己。人生的艺术，就在于使智商与情商携手共进，迈向生命的圆满。

全面地发展自己——通才取胜

1997年1月27日，《文汇报》在显著位置以《“通才教育”造就高素质学生》为标题，报道了复旦大学学生就业市场出现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动向：不少用人单位去复旦大学乐于录用“专业不对口”的毕业生，主修核物理的被金融业录用，学哲学的被证券业单位录用……为何？复旦大学近年来注重“通才”教育，鼓励文理交叉渗透，培养学生综合素质，是用人单位录用毕业生时不再看重“专业”的原因。

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教授在这条报道后的“专家点评”中说，多年来，复旦大学在人才培养模式上偏重于专业知识教育，造成理科的学生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知之甚少，文科学生对自然科学及当代科技发展

了解不多。当今世界，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，不同学科、不同专业领域的相互交叉和融合日趋明显，人才培养必须要适应这一变化的趋势，由过去那种单纯培养“专门化”人才，转向培养具有宽广知识面、较强开拓创新能力的“通用型”人才教育。

杨福家教授认为，在大学毕业生的头脑里，不应有“改行”两个字。主修物理的学生最后不必都去搞物理，大部分学生在毕业以后可转入经济、管理、新闻、法律等领域。因此，培养学生面向实际的态度和解决具体问题的有关自学能力，更显得重要。

复旦的学子们是令人羡慕的，接受通才教育之后，当他们走向竞争激烈的社会时，每人平均有三个以上的单位可供挑选。不言而喻，他们自信而从容。

美国曾对 1311 位科学家进行了为期 5 年的追踪调查，从他们取得的事业成就衡量，得出的结论是：通才取胜。计算机断层扫描仪（CT）的发明就是一个典型例子，它的发明者科马克是一位理论物理学教授，而同时，他对计算机技术和医学诊断技术也有较深的涉猎，正是博学的“聚变效应”触发了他科学灵感的火花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的组织决策理论，也是他将多学科知识融汇贯通的结果。瑞典皇家科学院 1978 年给西蒙的颁奖词中说，在广泛的定义下，他是一位经济学家，而他的著作远远超出他所从事研究的专长范围。他是文学学士，哲学博士，教过政治学、社会学、行政管理学、心理学、情报信息学、行为科学、计算机科学等等。

当然，通才并非通晓一切，这不可能，也不必要。博学而后专一，为自己的主攻方向，获取尽可能多的智慧，是其真正的含义。从一些理工类大学纷纷开设文学艺术、传统文化课程来看，通才教育也不只是知识的扩展，更重要的，它是对自己的人格魅力、人文素养、审美情趣的提升。

杨振宁先生在《读书教学四十年》这本书中回忆说，他很小时数学就念得很好。1934 年念完初一的暑假，他的父亲，身为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的杨武之先生，想找一个人来教他，但不是教他数学，也不是物理，而是请来了后来成为有名的历史学家的丁则良先生，教他《孟子》。《孟子》是儒家哲学的经典之一，从中可以了解整个中国的思想方式。孟子倡导的“养吾浩然之气”，在极端困苦患难中经过多方磨炼挫折，成为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”的大丈夫的理想主义精神，对杨振宁的人生思路，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，他认为远比他父亲在当时找一个人教他微积分要有用得多。

另一位美籍华人贝聿铭先生，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建筑大师之一。他主持设计的华盛顿美术馆东馆，被一致公认为是美国超级建筑展览橱窗；美轮美奂的香港中银大厦，成为香港的标志性建筑；卢浮宫前光彩夺目的玻璃金字塔，被巴黎人视为自己的骄傲。贝聿铭 1935 年留学美国，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接受全套美国式的建筑教育，而同时，中国文化尤其是老子的智慧，也使他获益匪浅。贝聿铭说：“我读老子的书读得很多。我想，也许他的文字对我的建筑思维的影响超过其他任何东西。”老子的“有无相生”的思想，道出了建筑艺术的全部奥秘：建筑是“空间的存在”，因此，建筑手段之“有”，是服务于建筑目的之“无”的。在线条简洁的几何图形上留出空白，使建筑整体栩栩如生、灵气飘逸，是贝聿铭作品的一大特征。而老子的“道法自然”的思想，使他更加注重建筑与周围背景的协调，香山饭店

便是他体现这一精神的杰作。

从人类的文化遗产中汲取智慧，把握人生、事业的艺术，是通才教育的一个主要课题。与人文素质的欠缺相对应，中国学生技能素质不高，也是普遍存在的现象。很多出国留学的人理论比别人高出一筹，动手能力却很差，限制了创造能力的发挥。杨振宁先生在解释其中的原因时说，这并非中国人天生不会动手，今天在美国念物理的华裔，获得特别成功的，大多数如沈元壤、朱经武、丁肇中、朱棣文，都是实验物理学家，说明中国人不是不会动手，而是很会动手。关键是要培养自己的浓厚兴趣，仅仅对条件加以抱怨是不够的。

一个人所取得的成功，往往是他的文化素质、心理素质、创造素质、技能素质、道德素质和身体素质等多样素质的综合表现。按照“木桶理论”：假定一只木桶是由多个高低不同的木板组成的，其容量取决于最低的那块木板，因为当液体平面超过最短的那块木板的高度时，液体就会溢出，因此，要增加木桶的容量首先必须加高最低的那块木板。这一理论更形象地启示我们，只有全面发展的人，才有望适应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，增加成功的机会。

最重要的事情是诚实——成功的基石是品质

百米赛跑，是奥运会上历史最长、最富传奇色彩的比赛项目。顷刻之间决出的“世界飞人”，骄傲地站在高高的领奖台上，向欢呼的人群挥动花束，任金牌在闪光灯下呈现出炫目的光彩，那是何等的荣耀。

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，加拿大短跑运动员本·约翰逊以令人难以置信的9.79秒的成绩打破了百米世界纪录。然而，等待他的却不是金牌与鲜花，而是世人的鄙视和唾弃。在随后的尿检中，他被查出服用了违禁药物，于是，比赛成绩被取消，金牌落在了卡尔·刘易斯的手中，本·约翰逊受到了禁赛两年的处罚。1993年3月，重返赛场的本·约翰逊服用兴奋剂被再次查出，从此，这位当年以“发令枪一响，比赛就结束了”为座右铭的新闻人物，又被处以终身禁赛。

四年之后，不甘寂寞的本·约翰逊，竟向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家法院起诉，要求取消国际业余田径联合会和加拿大田径协会对他的上述处罚。他似乎不明白，在与体育道德和奥林匹克精神的较量中，他注定是失败者。

与本·约翰逊相比，1932年奥运会女子百米赛跑金牌获得者——波兰选手斯坦尼斯拉娃·瓦拉西维支——称得上是“幸运儿”，她曾经长期保持多项跑步世界纪录。1945年6月24日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第一个大型田径运动会上，瓦拉西维支在全场的欢呼声中，仅用了11.2秒就跑完100米，直逼男子世界纪录。有人评论说，她比赛时“步伐迈得又快又大，就像一位男子”。

1980年12月，几名窃贼闯入了瓦拉西维支的家，在与歹徒搏斗时，她身负重伤。医生们竭尽全力抢救这位知名人物。当进行下腹部手术时，他们惊讶地发现，此人果真是地地道道的男子汉。丑闻传开，舆论哗然，瓦拉西维支被一致认为是本世纪最成功最出名的体育比赛的“性别作弊大王”。这种扭曲人性、违反天性所取得的成功，是人所不齿的。

追求成功，就是追求人生的完善，如同参与奥林匹克运动一样，它要求每一个角色遵守“公平竞争”的规则。那些投机取巧、见利忘义、不择手段

的作弊行为，即使侥幸达到自己的目的，在大写的人字上，留下的却是难以抹去的败笔。

某乡准备选配几名通讯报道员，消息传开，趋之者若鹜。一位年仅 18 岁的村姑表白自己已有多篇作品发表，甚至还获得过上海的大型文学期刊《小说界》小说大赛的三等奖。此言一出，一时显得鹤立鸡群，在众人钦佩的目光下，这位村姑讲述起自己的创作生涯：

“我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，就决心走自学成才的路子。我借来一本本中外名著看啦，琢磨啦，并学着写一些故事，稿子寄出后，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着、期盼着，可是一直杳无音讯。但是我没有气馁，没有退却，坚信勤奋就一定要有收获。终于，我的第七篇故事发表了，我高兴极了，愈发辛勤耕耘。一次，我们大队改选干部，激起了我的灵感，通过精心构思，写出了小小说《最后一票》。刚好我得知上海《小说界》杂志举办微型小说大赛，便寄了过去。不久我接到了编辑的来信，对小说提了修改意见。我改好后又寄了过去。结果不但发表了，而且还获得了三等奖。这次用的笔名是刘勇。”

村姑的娓娓叙述，使听者无不动容。不久，一篇题为《18 岁的村姑和她的小说》的通讯在省报发表，电视台的记者也闻讯赶来给她拍专题片。从此，一个个荣誉一顶顶桂冠让她应接不暇，直至出席了共青团中央第 12 次全国代表大会。

然而，这种春风得意，转眼之间便兑换成使她无法承受的羞愧。一位地方志编辑在见到她出具的所谓《小说界》颁发给她的获奖证书时，从纸张的粗糙和措辞上的不严谨断定，那证书是伪造的。《小说界》果然证实，《最后一票》的作者刘勇，与这位村姑毫不相干，同时，也从未出具过“三等奖”的证书。“自学成才”的动人谎言就这样曝光了，村姑自觉羞于抬头见人，便过起了隐居生活。

能够对可耻行为进行追悔，倒不啻为是对生命的一种拯救。比起某些在考场上作弊而炫耀“战绩”，津津乐道作弊技巧的大学生来说，那村姑的品质似乎显得并不逊色。

据南开大学理科某系的学生透露，在一次期末考试中，他们全班三十多名学生没有一个不参与作弊。成绩差的学生作弊，目的是“雄赳赳气昂昂，跨过及格线”；而成绩优异的学生作弊，目的是获取高额的奖学金。尽管在很多大学都有学生因作弊而被开除的例子，但作弊现象依然是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，令老师们痛心疾首。

1997 年初，天津的 7 所重点高校的数万名大学生陆续在一份《倡议书》上签名。而这份倡议书的内容竟然是在期末考试到来之际，向师长和社会保证：彻底杜绝考试作弊行为。这条题为《大学生拒绝考场作弊》的消息，在光明日报上作为“头条新闻竞赛”刊登后，令人们悲欣交集。

一位在美国有着丰厚收入的女士，参加了“英语学会”这个帮助各国人民学习英语的组织，来到了中国的一所大学。她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美好的愿望，但失望地看到，在几次讲座后进行的一次简单的测验中，五花八门的作弊方式令她无可奈何。

当她再次登上讲台时，她放下了讲义，一只膝盖抵着地，给 76 位中国大学生上了一堂使他们刻骨铭心的一课：

“我知道分数对于学生的重要性，知道你们需要一个高分去获得更好的